

我的青少年时期

聂荣臻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

江津是个丘陵起伏的地方，紧靠着长江，离重庆也近，自然风光很秀丽。吴滩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川东小镇。

在江津，聂姓是个大家族，到我这一辈，按家谱排是“荣”字辈，所以给我起名荣臻。我出生的时候，家庭已经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日除了干活的辛劳，就是为家庭生计发愁，留给我的印象是老诚持重，沉默寡言。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抚养我和妹妹上。年幼的妹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从小呆在家里。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一些，但一家人感情融洽，相处得很好。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正处于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国家政治上的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的日益活跃，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新学与旧学的交替和斗争，所有这些，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主义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

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

由于家庭困难，父母把我送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外祖父家距我家不远，是当地比较富有的一个地主家庭。教私塾的，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但在外祖父家，也有难得的乐趣。那时，我三舅在重庆政法学校读书，政法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一回来，就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倾向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在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我虽年纪很小，不懂政治，但觉得他们的争论很有趣，对城里来的消息也感到新奇。尽管搞不清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无所谓，但已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这样，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不知不觉地闯进我年幼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清王朝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摇摇欲坠，整个四川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

由于四川富饶，清政府不甘心放过这块肥肉，加上四川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它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但是，清政府又深感鞭长莫及，因为四川交通不便，它与外界的主要通道是靠长江，运兵进川和运物资出川，全凭着长江。除长江之外，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了。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谈，清朝的官员扬

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员。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人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语，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字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

以后，我听到的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在四川闹得最为轰轰烈烈。清王朝为了侵吞四川民间为办铁路而筹集的巨款，竟然宣布四川的铁路由民办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四川人民对清王朝的愤恨，就象火山一样迸发了，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那阵子，一天几个消息，一会儿听说捉了赵尔丰，一会儿又听说捉了端芳，以后又听到把这两个家伙先后处决的消息。当我们听到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心里真痛快极了！

在这伟大的变革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整天在一起议论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老师也不怎么管。在当地，我们最关心的是“同志军”围攻合江。合江知县黄炳燮，凭借合江城三面濒江，城墙坚固，只有西门是陆路出入口，而这里又是高岗，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易守难攻。他坚守合江，拒不投降，同志军汇集各路民军几万人，围攻合江几十天，从九月下旬一直打到十二月初，黄炳燮才觉得大势已去，出城投降。但到后来，合江又落到云南军阀手里。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我也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知识面逐渐

开阔起来。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第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辛亥革命带着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复辟称帝，接着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对我的思想触动最大。

江津中学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包括《新青年》这样的进步刊物。另外，四川虽然交通闭塞，但电报还是通的，各种消息通过电讯传到四川，这些消息又在报刊上广泛传播。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

签订二十一条以后，大量日本货流入中国，也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处在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所有百货商店摆的几乎都是日本货。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反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寒假中，由我们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我在寒假中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这是我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不久，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期，江津县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到达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津中校长邓縉仙（此人是国民党员）、学监李耀群、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

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全部烧毁。这样一来，引起商人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我们就离开学校。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期，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长期盘据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他消灭。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

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

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们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的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

九年暑假期间，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志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那里办了护照。

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

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一九二〇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加入了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军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园里，默默地缅怀几位先烈，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为我的母校哺育了这样几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现在江津第一中学已经为他们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先烈，教育后人。

（本文摘自《聂荣臻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聂荣臻同志中学生生活片断

林凤栖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功勋卓著，举世共知。笔者有幸，能在聂荣臻同志的母校四川省江津中学现为江津第一中学读书，并于解放后在校一直从事工作，耳闻目见(主要是资料)，深感中学时代的聂荣臻同志，不管在学习上、作风上，还是工作上都非常值得学习，令人钦佩。

聂荣臻同志从江津县九如镇(现为油溪镇)高等小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七年八月考入江津中学学习，直到一九一九年底离开。那时聂荣臻同志学习刻苦。作风严谨，生活简朴，善于思考。上课听讲专心，课后复习认真，下晚自习还在油灯下读书，并常常独自在僻静的过道上面墙而立，集中精力看书。学习中遇到难题，他从不轻易放过，也不轻易去问别人，总是查阅资料，反复思考，直到弄清楚为止。他特别爱好文学，很会讲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的作文曾几次在全校张贴展出，保存下来七十多篇作文(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中，就有三篇得一百分。学校现在仅存的有关当年他的操行考查簿，装帧虽然简朴，但字迹清晰可辨。它记载着：

“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语言——不欺、温和；气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

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

聂荣臻同志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和傅汝霖等同志一起，冲破学校的阻拦，组成“江津学生联合会”。经常上街游行，宣传讲演，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并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他们先宣传劝告不用日货、不卖日货，后对不听劝告的“乾坤泰”、“鸣盛和”大商店将搜出的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还派人到河边查看，一发现装有日货的船只，就不准靠岸。唯利是图的少数商人，勾结驻军团长王天培、县长聂述义干涉镇压。在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议时，王天培等在会场四周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可是，同学威武不屈，据理陈辞，申明如再不听劝告，即将收存的日货焚毁。少数商人以为有驻军支持，哪里会听劝告呢，会议当然没有结果。学生们便采取了焚毁日货的行动。

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一天，江津中学的同学行动起来了，校长邓缙仙(鹤丹)学监李耀群等百般阻拦，并令关上校门。学生愈来愈多了，计有一百多名(当时全校约二百名学生)。聂荣臻、傅汝霖等在群众中鼓动大家：“不要怕，冲出去！团结就是力量！”一百多名同学终于冲出大门。事先，他们就与甲种农校联系过，此时农校一百多名学生正在街头。在那个时代，有几百人上街游行，可真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聂荣臻同志有胆有识，他在队伍中，昂首挺胸，每到稠人广众处，就侃侃而谈、讲明利害，不少人受到鼓舞。大队伍到达“文昌宫”，群情激愤，游行队伍涌进去，抬的抬，抱的抱，将日货一古脑儿送到河边烧毁，火焰漫

天，显示出革命学生的斗争精神。

反动派的面目更加狰狞，就在烧日货的第二天，王天培等带着武装士兵，气势汹汹地赶到学校，妄图下毒手。校长在反动派的授意下，立即开除了一些同学，并准备在学期结束时默退学生。傅汝霖同学被开除了。学生们又掀起了反对开除爱国青年学生的学潮。聂荣臻同志积极组织同学参加这一斗争，支持被开除的同学为了革命而出走。聂荣臻同志也毅然抛弃学籍，离校到重庆，并决定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聂荣臻同志是独子，又是长孙、大外孙，要到外国去，家庭的劝阻那是可以想象的。经过努力，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聂荣臻同志终于和百余名勤工俭学的学生，英姿勃勃，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去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聂荣臻同志曾为母校题词，并且附了一封情意深厚的长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斗争的情况。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江津一中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夙富革命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学校就有不少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记得和我们一起的就有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和吴平地等同志。傅、戴、钟三位同志先后去法勤工俭学，回国后英勇斗争。但不幸，傅、戴两同志牺牲于洪湖之役；钟汝梅同志也在上海地下斗争中光荣牺牲。去北京的吴平地同志，后来与李达同志一道遇难……”。

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度过他们中学时代的。他们刻苦学习，关心政治，寻求真理，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青少年一代好好学习 and 发扬。聂荣臻同志曾亲临母校视察，又两度题词勸

励师生，并多次向我县到京的同志询问母校的情况，这给我们全体教职员留下了难忘的幸福的记忆。他的关怀，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关心和对青少年一代寄托的殷切期望。我们为有这样的老校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辛亥革命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 布告全川父老文

肖 湘

编者按：肖湘，字绮笙，荣县人。早年愤清庭腐败，向往革命。曾与我县邓鹤丹同去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荣县从事教育，宣传革命。县令捕杀革命党人，先生藏艾叶滩避难。旋即应邓鹤丹之约来我县白沙黑石山聚奎学校隐居教学。

辛亥（1911年）六月，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爱国运动。先生同聚奎堂长邓鹤翔等人首义于白沙。接着，江津城宣布独立，建立蜀军分府，召集各乡同志军在城郊大沙坝整编为十五营，支援合江。白沙首义时，先生草此檄文。

民国建立，先生任嘉定中学校长。民国七年，邓鹤丹长江津中学，肖湘在来此任教期中病故。终年四十三岁，葬于黑石山。

盖闻普天公义，在明顺逆。英雄首选，在识时务。满洲女真遗丑（1），乘机入关，盗窃神鼎（2），二百有六十年。子女玉帛，肆行屠扰。典章文献，恣意颠秽，腥膻淫德，昭播寰瀛（3），天人共愤久矣。迩来外海岳沓（4），危迫朝

露。人怀奋拔，思图生存，而彼騃瞿奔触（5）眈睢酣嬉（6）。鼯鼠技穷（7），狼獾性犷（8）。尸居大宝（9），索断焦梨（10）。四布周陆（11）钜我秀桀。百计欺骗，塞我聪明，皮傅立宪（13），督乱新政。假途仁义，实行括搜。疮痍遍野，彼则培园陵、崇宫寝，竭脂膏于髑髅（14）。灾异频年，彼则掷金钱，恤邻封（15），倾珠玉于沧海，老弱罢于转餉，盗贼满于山林。彼则赔款割地，售矿贡路，沥汉族之血液，续狐尾之羈魂。更或举吾人汗血筹办之路，涓滴凑集之款，私行抵押，网罗入官。塞口防川（16），强力压制。如今日川汉奥汉铁路收归国有之甚者。嗟我同胞，生命几何？财产几何？日割月烹、谁堪兹痛。而谐臣媚子（17），社鼠城狐（18），犹且盲不知天，孽同捣鬼，各出狡狴（19），争相维姿（20）。剔肉剜心，鬼魔互媚。若盛贼之为汉奸，（21）其罪诚不足数。若赵贼之作虎伥（22），其肉真不足食哉。吾蜀以保路故，联合同志为极和平之要求。盛赵二贼，狼狽为奸，代虜弹压。禁锢蒲罗诸英（23）。钩沈宝印（24），装绘盟书。诱夺戈矛，乾没首级（25）。饰词诬陷，诡计调兵。为一网打尽之虞机，置同胞生命于沸釜。吾民意图保路，不忍为激烈手段，破坏秩序团体。犹复扶老携幼，涕血辕门。请诉呼抢，蒲伏衢市，而赵贼悍然不顾，始则背理伤天、开炮轰击；继则惊魂裂魄，设守闭城。假图谋不轨之澜言，籍巡防伪军为鹰犬。淫威所逞，妇孺不留。妖氛所加，鸡犬无类。纵兵四掠，城市丘墟。新温一带（26），尸山血海，兵燹之场，尽是赵贼弹雨马泥蹂躏之地。此真扬州十日未有之奇灾（27），嘉定屠戮未尽之遗毒也（28）。本会迫于公愤，大起义师。远近闻风，争先投效。旗幡遗孽（29），只用槌笞，绝塞旋凤（30），不待鞭打，义旗既鬯（31），天

日为开。不一月间，滇湘赣粤，同挥反日之戈(32)，苏皖豫陕，共舞降魔之杵。黔晋并兴，浙陇遥应。而武汉光复，尤在一昼夜间。全鄂旧用之铃印，尽颁新换之关防。父老扶杖，重睹汉旌(34)。动色欢呼、飞腾霄汉。天心人事，概可推知。而本会原为各省之先驱，今反濡滞其骏步。不特有惭于汉关秦月(35)，亦且贻羞于锦水巴山。用是再接再厉(37)，大声疾呼，气勇如山，风云变色。誓扫奸丑，不共天日，戮力同心，分途并进。直捣成都，以为根据之雄镇。分领夔渝，以联川汉之声威，勸哉同胞(38)，共兹义愤。成败之机、决于一朝。披发叫天(39)，齐拼死战。沉舟破釜(40)，誓无还心。纷草木以皆兵，挟风雷而并起。东南半壁，指顾肃清，大集义府，直指燕云。喋血伪都，扬旌寰海，倾渤海以灌蜚(44)，捧昆仑而压卵(45)。无坚不破，有札皆穿。日月重光、山川再秀。荐勋汉祖，告类帝天(46)。然后隆四千年之汉胤于九天，跻四百兆之同胞于平等，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凡我神胄(47)，不乏人豪，丁此时艰，当同义愤。胡弗乘机早出，共建洪勋，即或已入仕途，苟能翻然悔悟，弃暗投明，或任原官，或与超擢。亦无不量才授事，置腹推心。唐太宗削平胡虏，明太祖重建汉族，炮尽雷轰，人皆虎贲(48)。蛟龙乘春而起蛰，虎豹傅翼以生威(49)。诸父老共处川中，深明大义。投袂而起，杖策来归。踊跃用兵，同仇敌忾。本会当立马以待(50)。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51)。

〔注释〕(1)满州女真遗丑：指清朝统治者系满州女真族后代。(2)神鼎：引申指国命。(3)招播寰瀛：指恶迹传播很广。(4)外海岳沓：指帝国主义者纷纷侵

略。(5) 騑瞿奔触：马行威仪也。騑瞿，急遽奔走貌。

(6) 眈炎鼯嬉、眈(Shi)炎(yar)、疾视、犹闪烁。

(7) 鼯鼠技穷：谓一切阴谋手段都用尽了。鼯鼠、亦称“大飞鼠”，前后之间有飞膜，在树间滑翔，尾长有夜行性。

(8) 狼獾性犷：獾，狼类。犷，谓犬猛兽不可近，引申为凶悍蛮横。

(9) 尸居大宝：大宝，即帝位。指居其位而不尽其职，如死人然。

(10) 索断焦梨：意指搜括尽干枯草芥。

(11) 四布周陆：陆，指围猎之圈。意谓四周围满警卫。

(12) 钜我秀桀：意即杀我优秀人士。钜同斲。桀同傑。

(13) 皮傅立宪。谓凭着一知半解，附会其说。

(14) 竭脂膏于鬻髅：鬻髅，人死腐烂后的骨头架子。

(15) 恤邻封：指接邻的帝国主义。

(16) 塞口防川：堵塞老百姓之口不让说话，比防川更难。

(17) 谐臣媚子：专事附和和谄媚的小人。

(18) 社鼠城狐：比喻依势为奸的人。亦作“城狐社鼠”。社鼠、社庙中的鼠；城狐，城垣中的狐。

(19) 各出狡狴：狡狴，谓人狡诈奸滑。

(20) 争相维娄：即争相拉拢勾结。维，连结。娄，牵拉。

(21) 盛贼：盛宣怀(1844—1916)近代买办官僚。1910年为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用“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铁路权作抵押，大借外债，激起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爆发，被撤职，逃亡日本，仍继续进行出卖汉冶萍企业的活动。

(22) 赵贼：赵尔丰(?—1911)清末汉军正兰旗人、1911年署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民众，激起四川人民的武装反抗，后被民军杀死。

(23) 蒲、罗：蒲、蒲殿俊(1875—1935)1911年铁路风潮起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罗，罗纶。四川保路同志会付会长。

(24) 钧沈宝印：探索幽渺。这里是精心仿